

编者按：

本期专题论坛的主题是“完善城市治理 共享美好生活”，共有10位专家学者分别从国际社区面临的治理困境、跨域治理存在的制度梗阻、新质生产力与城市治理的互动逻辑、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现实挑战、城市社区治理的深刻转型等角度入手，深入分析社区社会工作介入国际社区治理的路径、政治势能驱动制度调适与社会整合支撑的耦合规律、新质生产力赋能城市治理的关键场景、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价值功能、城市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定位等，针对性提出塑造居民共创的可持续内生循环生态、构建跨域城市治理共同体、推动城市治理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化多元参与主体数字治理素养、促进社区工作者在实践中重构与居民的互动关系等建议措施。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国际社区治理创新： 资产培育、双向互哺与角色重构

文 \ 邵任薇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省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员；广东国际志愿服务研究院研究员

熊梦碟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雅欣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国际社区因多元文化交织、利益诉求异质化的特征，对治理的专业性与跨文化协同性提出特殊挑战。社区社会工作以其跨文化视角与专业方法，成为破解国际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力量。本文选取美国阿灵顿国际社区、瑞典哈马碧滨水新城两个欧美发达国家中的国际社区治理典范作为案例，剖析其应对治理困境的实践逻辑。阿灵顿国际社区通过构建制度化参与渠道、链接多元资源与技术应用相结合的多维赋权机制，推动居民从决策参与到行动落实的深度赋权；哈马碧滨水新城依托系统整合的“共生城市”理念、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方法以及多层次参与机制，构建从环境教育到居民共创的可持续内生循环生态。这些实践表明，社区社会工作介入国际社区治理的核心在于：培育文化技能等隐形资产替代资源消耗，通过平台赋权与文化融合构建双向互哺的价值循环路径，并推动社工从服务者转型为催化社区自主治理的协作者。

关键词：社区社会工作；国际社区治理；赋权

DOI: 10.3969/j.issn.1674-7739.2026.02.001

一、引言

国际社区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人口跨国流动的产物，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其以跨国界居民构成、多维文化交织、异质性

利益诉求为核心特征，成为现代社区治理的复杂场域。不同国家、种族的群体带着各自的语言体系、价值观念、生活习俗共生共存，既孕育着文化交融的可能性，也潜藏着身份认同冲突、公共资源争夺等深层次矛盾。

社区社会工作的诞生与跨国群体治理紧密关联，其从工业化时期对贫民窟贫困、移民适应问题的福利救助，到二战后“社区发展”理念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注重赋权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从早期关注困难群体救助，逐渐转向推动社区整体发展与治理创新。在国际社区中，社区社会工作已成为社区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它不仅作为联结各方的纽带，协调政府、市场与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破解“治理悬浮”困境；还通过赋权增能，激活居民主体性，将个体诉求转化为集体行动；更依托专业方法为国际社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社区社会工作通过培育信任网络与共享价值，增强社区韧性，为国际社区中的居民群体构建起基于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的精神联结。

当前，全球化带来的人口跨国流动、多元文化碰撞，使得国际社区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原住民与外籍居民的权益协调、技术工具与人文关怀的平衡、短期效益与长远发展的兼顾等问题，社区社会工作通过文化交流搭建对话平台，培育跨种族互助网络，构建包容共生的社区生态；以资产为本的视角激活社区内生资源，建立技能共享与生态共治机制，在解决即时问题的同时夯实长远发展基础，推动短期改善与长远发展的动态平衡。社区社会工作为国际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将专业价值与治理实践深度融合，推动社区治理转向更加灵活适配、多元协同的方向，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本文选取美国阿灵顿国际社区、瑞典哈马碧滨水新城这两个欧美发达国家中的国际社区典范作为研究案例，深入剖析其在应对社区治理困境时的实践策略与内在逻辑，为中国语境下国际社区的治理创新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二、国际社区典型案例探析

（一）案例一：美国阿灵顿国际社区

1. 案例基本情况

美国阿灵顿国际社区作为高度城市化的社区，曾面临社区认同弱化、居民参与不足、绿

色可持续发展缺乏内生动力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社会工作者协同县政府推动了一系列以制度性参与为核心的干预措施。

首先，社工与政府合作建立了长效的“社区管理计划”，通过选举社区代表和楼区代表，系统收集居民意见，并每月与县政府磋商，将交通安全、公园建设等民生议题纳入预算流程。此外，社区项目需获得60%居民支持方可实施，^[1]使居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决策参与者。

其次，为提升社区行动能力，社工推动绿色出行与社区营造相结合。他们发起“行走阿灵顿”项目，设计20余条徒步路线，并将这些路线与公共交通、社区资源节点（如公园、历史建筑）紧密衔接，同时开发“弃车减肥”手机应用，帮助居民规划绿色出行方案，计算碳减排量与健康收益。此外，“安全上学路线”项目则通过学生参与式规划，强化了“绿色出行从儿童抓起”的社区意识。最终，这些干预显著提升了社区凝聚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阿灵顿国际社区被评为“全美步行友好社区”，^[2]成为社区赋权治理的典范。

2. 案例分析——多元共治的赋权实践

阿灵顿社区的案例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工作在促进公平治理和社区赋能方面的核心作用。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通过系统性地应用专业的社区工作方法，将可持续理念转化为扎实的社区实践。

（1）参与式规划与能力建设赋权

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角色之一是构建制度化、可持续的公众参与渠道。阿灵顿县建立了运行数十年的“社区管理计划”，确保社区发展能真实反映居民诉求。在此机制下，由社区选出的代表负责收集居民意见，并与县政府部门每月磋商，将居民关心的具体事项（如交通安全、公园改善）纳入正式的决策流程。社工作为使能者（赋能者），通过组织工作坊、提供咨询，帮助居民（特别是新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理解市政规划和预算流程，训练他们将日常观察（如某路口的安全隐患）转化为清晰、可行的政策建议。这种能力建设旨在提升居民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提

供一次性的征求意见，确保了参与的深度和质量。例如，交通规划团队会以街区为单位进行设计和改造，应用技术手段打造徒步路线，并将这些路线与公共交通、社区资源相连，此过程本身就融入了听取居民意见的参与环节。

（2）资源链接赋权

社工作为资源链接者，^[3]精准链接资源，系统性地将政府部门的规划资源、社区内的社会资本以及企业的技术资源进行整合，构建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网络。在推进绿色出行和智慧增长项目时，他们协调交通部门、社区组织和商业机构，共同完善步行与自行车道网络，优化公共空间。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亚马逊第二总部的规划：社工积极链接企业投资与社区需求，促使企业承诺打造并向公众开放大型社区空间，包括中央花园圆形剧场、社区活动空间等，并将这些空间向公众开放，使其成为举办农贸市场、户外音乐会的社区中心，而不仅仅是企业私有领地。这种资源链接将外部投资转化为社区共享的资产，体现了空间正义的理念。

（3）制度倡导与政策转化

最深层次且最具可持续性的赋能在于制度倡导。社工作为倡导者，^[3]通过持续的努力，推动有益的社区实践固化为长期政策和制度。阿灵顿县的成功在于将“公众参与”本身制度化。例如，其社区管理计划明确规定，工程项目方案需获得社区居民的支持方可获得县预算资助。这确保了社区意愿能够实质性影响决策，而不仅仅是咨询。此外，社工和社区倡导者还积极推动将绿色、公平的发展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阿灵顿县将绿色社区建设纳入“智慧增长”的总体框架，并制定覆盖土地利用、交通、自然资源保护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规划。这些政策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确保了积极成果的长期性和可复制性。

阿灵顿国际社区的经验表明，社工在社区发展中扮演着使能者、资源链接者和制度倡导者的关键角色。^[3]通过参与式规划确保方向正确，通过资源链接提供支撑，最终通过制度倡导固化成果，从而系统性地推动社区走向更加包容、韧性和可持续的未来。

（二）案例二：瑞典哈马碧滨水新城

1. 案例基本情况

哈马碧滨水新城曾经是斯德哥尔摩工业发展的核心地带，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里却变成了工业荒地，水质与土壤遭受严重污染。当地政府决定对哈马碧地区进行全面整治与重新规划，以超越时代的环保理念与绿色科技，重新打造了一个低能耗、高循环、以人为本，与自然环境共存共生的全新社区。^[4]

社工与规划团队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协调与催化角色。他们的工作重点并非直接进行技术设计，而是致力于将复杂的“哈马碧模型”——这一整合了能源、水和废物管理的闭环系统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理解能力相衔接。^[5]此外，项目还设立了“湖墅工作室”，^{[6][7]}作为社区实务的论坛，与居民、访客共同探讨可持续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这体现了通过社区教育促进居民从理念认同到行为改变的努力。同时，鼓励资深社区居民成为社区持续更新的驱动力，支持他们发起“哈马碧生态城2.0”等项目，^{[6][7]}鼓励居民在建筑节能、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参与创新，从而将居民从生态生活的实践者转化为共同设计者。

经过系统性改造，哈马碧滨水新城取得了显著成效。该模式也逐渐成为全球可持续社区发展的典范，其经验正通过“中国—瑞典哈马碧生态城联盟”在中国烟台等地的项目中得到借鉴和推广。

2. 案例分析——社工催化社区资产循环：哈马碧滨水新城可持续转型实践

瑞典哈马碧滨水新城的成功转型，不仅是工程技术的胜利，更是社区工作专业方法深度融合与成功应用的典范。社工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主要方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共生城市”的系统工作方法

社工与规划团队采用的核心是系统思维和“共生城市”（symbio city）工作法。这种方法强调将城市看作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要求打破不同专业（如能源、水务、垃圾处理、城市规划）之间的壁垒，进行协同设计和整合优化。社工在此过程中的角色是协调者和系统促

进者。他们协助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如工程师、规划师、环境科学家等）与社区居民共同工作，确保技术方案不仅在技术上可行，也能被社区理解和接受。其工作重点是优化“人—技术—环境”这个复杂系统内部的互动关系，致力于实现资源消耗的最小化和循环利用的最大化，这本身就是社会工作“赋能者”角色在宏观规划层面的体现。

（2）社区赋能与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方法

此外，该案例还深刻体现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方法的运用。社会工作作为能力建设者和资源链接者，其工作重点在于识别和激活社区的内在资产，而非仅仅弥补其不足。^[8]项目设立的湖墅工作室是一个关键举措，它作为举办社区论坛、促进居民交流的重要场所，是通过社区教育促进理念认同的体现。社工通过它向居民和访客讲解复杂的生态循环系统，将先进的技术理念转化为居民可理解、可操作的日常行为指南。这不仅是社区教育，更深层次的是赋能，确保居民能有效使用社区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并链接社区意见领袖和湖墅工作室这样的民间平台，将社区居民的知识、热情和社交网络视为宝贵的“社会资产”，鼓励居民持续推动“哈马碧生态城2.0”“ElectriCITY”等创新项目，^{[6][7]}使居民从生态生活的“实践者”转变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设计者和驱动者”。

（3）多层次社区参与式发展方法

社工运用参与式发展方法，^[9]构建了多层次的社区参与体系。在信息共享与教育层面，通过“湖墅工作室”进行持续的环境教育。在咨询与协作层面，社区规划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早期阶段就通过工作坊、会议等形式征求居民意见，并将可持续生活的指南（如垃圾分类标准、节能建议等）设计得通俗易懂，甚至采用图示化、多语言形式，确保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参与。在共同创造层面，支持居民自主发起改进项目，使居民参与到社区未来的规划设计之中。这种深度的参与确保了技术方案不仅先进，更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持久生命力。

综上所述，哈马碧滨水新城的成功，展示了社会工作如何通过系统整合、社区赋能和参与

式规划的专业方法，将高科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化为一个充满活力、人人参与的社区现实。社工的角色是“催化剂”和“黏合剂”，确保技术工程的运用与社区社会的健康发展紧密结合，最终实现了真正的内生可持续性。

三、社区社会工作介入国际社区治理的启示

（一）资产培育：挖掘在地智慧，激活内生价值循环

在社区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需求为本”是主流模式之一，其核心理念是以居民需求为社会工作和社区治理的出发点。该模式通常聚焦社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寻求快速直接的解决途径，导致社会工作者更依赖有形资产和外部资源。^[10]尽管在短期内对发展初期或资源匮乏的社区作用显著，但易引发“资产窄化”，削弱社区内生动力，长期资产消耗也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区挑战，尤其在国际社区这类现代化、多元文化背景下更显乏力。

美国阿灵顿国际社区践行资产培育的理念，聚焦于提升社区可持续行动能力与公共参与效能。社工采用“社区参与”与“赋权”的方法，发掘并整合居民对社区空间使用的在地经验与需求，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社区规划与行动方案。在“行走阿灵顿”项目中，社工与居民共同设计徒步路线，衔接公共交通与社区资源节点，并开发“弃车减肥”应用程序，将居民出行习惯转化为促进健康与减排的社区行动资产。

瑞典哈马碧滨水新城在应对工业污染与推进生态重建的过程中，采用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路径，着重识别并激活社区内部的认知资产与参与潜能。社工通过“社区教育”与“赋能”的方法，设立生态信息中心“格格特”，将复杂的生态循环系统转化为居民易于理解和实践的行为指南，从而提升居民的生态素养与实际操作能力。同时，社工将居民的知识、热情与社交网络视为重要社区资产，支持居民发起“哈马碧生态城2.0”等创新项目，鼓励他

们在节能、垃圾处理等方面提出改进方案。这一过程不仅促使居民成为生态社区的共同设计者，也实现了技术资产与社会资产在社区层面的深度融合。

因此，在国际社区治理中，社区社会工作的实践理念正从资产开发转向资产培育。社工需超越短期显性资源利用，运用“社区资源发掘与整合”“社区参与”“社区教育”等方法，系统激活居民的在地智慧。阿灵顿、哈马碧国际社区的经验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在于普通人的智慧。唯有通过资产培育，将居民技能转化为增值性社区资产，构建自我驱动的发展机制，才能有效应对国际社区的复杂挑战。

(二) 双向互哺：协作互惠机制，凝聚多元共识

国际社区的治理背景复杂，我国传统“需求—供给”的单向服务模式高度行政化，社区居委会主要承担基层政府交办的行政职能，居民则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导致服务与真实需求错位，陷入“服务悬浮化”困境。^[11]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其自身的能动性 and 主观性被忽略，难以精准、全面地满足其真实需求，反而不利于社区的有机团结与共同体的生成。

阿灵顿、哈马碧国际社区的实践表明：唯有通过“平台赋权”与“文化融合”的协同实践，使居民从“被动接受者”进化为“积极行动者”和“共同决策者”，方能激活生活智慧与社区责任的交融互哺，进而推动多元群体与社区成为彼此滋养的“价值共生体”，最终构建出可持续发展的共生治理生态。

1. 平台赋权：激发社区内生动力

社工依据“赋权”的社区工作理念，通过构建居民主体性、提升其内在能力，以强化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参与度和行动力。^[12]“平台赋权”的本质是构建“居民智慧输入—社区权力输出”的交换机制：居民以生活经验哺育社区治理升级，社区以决策权反哺居民主体性生长。

美国阿灵顿国际社区通过社区参与、组织与赋权方法，建立并长期运行“社区管理计划”，为居民提供了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的

机会，将其日常生活观察转化为有用的政策建议，使居民从意见表达者升级为实质性的决策参与者。瑞典哈马碧社区则通过“湖墅工作室”这样的民间平台系统挖掘居民智慧，进而转化为可执行的社区项目方案，使居民从生态生活的实践者转变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

真正的赋权是让居民的生活经验切实改变社区规则。社工应搭建一个让居民的生活智慧发挥作用的平台，即“权力—能力”交换平台，激发居民主体性与社区内生动力，让普通居民的生活经验能够切实改变社区的管理规则。

2. 文化融合：共创公共符号

“文化融合”是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与重要工作方法之一，通过协作创造不同群体的公共文化符号，推动文化认同的形成，继而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跨文化智慧的制度化留存与可持续传播，推动双向互哺的落地。在跨文化协作过程中，不仅构建了多元文化群体的共同文化符号，而且还拓展了居民的社会资本网络，帮助其形成互助信任关系。这种实践超越了简单的文化共存，而是通过协作创造、制度设计，使多元群体在社区中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与发展。

阿灵顿国际社区在推动绿色出行与社区营造过程中，通过“行走阿灵顿”项目及“安全上学路线”计划，将徒步路线、公共空间与社区历史资源相衔接，创造出以“步行友好”为标志的社区公共符号。社工通过资源链接的方法打造出社区共享空间，居民在此空间开展农产品贸易、音乐节等活动，增强了跨群体互动与互助，推动了社区认同的进一步深化。

在哈马碧滨水新城，社工通过居民参与式工作坊将复杂的生态循环理念与生活场景对接，创造出独属本社区居民共同的生态文化符号。社工进一步支持居民将这些符号融入社区创新项目中，使其成为推动持续生态实践的文化动力，促进生态理念深植于社区日常生活与发展规划中。

真正的公共符号诞生于共同协作当中。社工应在“文化融合”理念的指导下，承认、理解多元和差异，运用社区参与、社区组织、社

区倡导等方法，推动居民深度参与协作，凝结公共文化符号，并通过制度设计使其转化为持久有效的公共资产，实现文化价值与社区责任互哺的双向循环，增强社区包容与凝聚力。

（三）角色重构：从服务主导到隐形守护，推动自主治理

在全球化社区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工的核心任务不再仅仅是提供服务，更是协助社区搭建自治机制，催化社区形成脱离外部干预仍能持续发展的治理生命体。社工角色由此实现从服务提供者向治理协助者的重构。

阿灵顿国际社区社工从传统的服务提供者转向制度倡导者与资源链接者。他们通过建立“社区管理计划”等长效参与机制，将居民纳入预算与规划流程，并推动绿色出行项目与社区资源整合。社工逐渐转变为协调与支持角色，使社区代表与居民组织能够自主与政府磋商、推动项目实施，实现从“社工主导”到“居民主导”的治理转型。

哈马碧滨水新城社工亦以协调者与系统促进者角色替代直接干预的服务提供者角色，协助不同专业团队与居民协同工作，确保技术系统被社区接受并有效使用。随着生态信息中心的运作与居民自主项目的开展，社工逐步转向支持性角色，将日常管理、活动组织等职能移交社区居民与组织，实现从“为居民服务”到“由居民驱动”的转型升级，完成向“隐形守护者”的角色蜕变。

当社区能在脱离社工主导的情况下自主更新治理规则时，可持续发展便内化为社区自我维持的核心能力。因此，社工需超越短期问题干预的路径依赖，实现自身角色进化，通过隐形支持助力社区自主发展。

尽管国外国际社区与中国国际社区在治理结构、文化背景与发展阶段上存在差异，但其治理逻辑与创新方法对中国具有深刻启示，尤其体现在应对多元复杂性问题的底层逻辑与演进路径，即如何激活内生动力、构建协作机制、实现可持续治理——为中国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参照。

综合阿灵顿、哈马碧国际社区治理的经

验，其可持续治理的核心在于推动治理范式转型，构建以资产培育为前提、双向互哺为路径、角色重构为支撑的新型治理框架，为中国破解治理困境提供了针对性思路。

首先，在治理结构上，中外国际社区存在差异。“欧美社区治理主要是政府、社区组织、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13]其运作模式多以居民自治与社会组织为驱动，政府发挥辅助作用；中国社区则遵循“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的治理框架，居民参与常呈“被动响应”状态。“角色重构”有利于重塑政府、社工、居民之间的传统关系与权责边界，这为中国社工与基层治理者指明转型方向——从包办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系统搭建的“赋能者”与“隐形守护者”，将决策权、行动权部分地从行政系统“移交”或“共享”给居民，并让社工的专业力量聚焦于系统赋能，在现有结构下激活居民自治，形成“居民主导、系统自运行”的社区治理生态。

其次，文化融合方面，中外国际社区面临不同的社会基础：国外的多元文化共存历经长期的自然演化，社会资本积累深厚；而中国的国际社区多为新兴高端居住区，中外居民之间联结较弱。“资产培育”与“双向互哺”共同构成创新社区居民之间互动与认同的核心机制。“资产培育”系统挖掘社区内的隐形资源，如居民的技艺与智慧，将其转化为社区发展的内生资本，从而推动治理思维从被动“解决问题”转向主动“创造价值”。“双向互哺”通过搭建“国际议事厅”“文化共创工作坊”等实践场域和空间，将居民的差异化经验转化为共同设计的治理方案。二者的协同作用，推动社区交往从单向的“文化展示”升华为共同参与的“文化共创”。这种基于资产认同的协同协作进一步增强了社区的归属感与文化资本。

再次，在专业发展上，国外的社区工作体系成熟，社工角色已从服务提供者转向系统赋能；而中国社会工作仍多处于事务执行层面。随着治理结构转向居民自治、文化融合走向深度共创，这些复杂的实践场景必将“倒逼”

社会工作进行专业升级。无论是实现“角色重构”的权责转移，还是开展“资产培育”与“双向互哺”的社区营造，都离不开一支现代化的专业社工队伍作为执行基础和驱动力量。同时，在推进这三个目标实践落地的过程中，也会反过来对社工队伍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推动其完成现代化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启示不等于照搬。国外经验的成功，恰恰在于其与当地制度、文化的高度适配。因此，中国国际社区的治理创新，必须在吸收核心理念的基础上，进行语境化改造与制度再设计。首先，在治理理念上必须超越依赖行政“输血”，转向深挖社区内生的多元文化、高技能人才、生活智慧等“隐形宝藏”，借鉴“社区能力银行”等本土化的创新形式，激活“造血式”的发展动能，培育社区资产。其次，在路径上构建“双向互哺”机制：搭建制度性参与平台，比如“国际社区议事厅”，确保中外居民能够实现平等发声；设计“共做共学”项目，在协作中消融文化隔阂，助力凝聚共识；并清晰设计“参与一反哺”的循环路径，让贡献者切实受益。最后，在角色上，社工应加速从服务提供者转向赋能协作者，助力培育居民领袖、提升自组织能力及运用数字化治理工具等，并规划“战略退出”，最终促成社区“自主治理”。对于我国国际社区的治理，关键保障还在于发挥党建引领下的资源整合优势，并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为这一转型提供坚实后盾，才能构建出具有归属感和韧性的国际“家园共同体”。

说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技术—结构’视角下政社交互式应急协同效能研究”（项目批准号24BZZ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发达国家社区管理模式[J]. 开放潮, 2005(9): 32-33.
- [2] 金悦磊. 美国年轻人为什么喜欢扎堆这个社区? [EB/OL]. (2020-05-23) [2026-01-15]. <https://www.jfdaily.com/wx/detail.do?id=250982>.
- [3] 王思斌. 社会工作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4] 刘慧. 瑞典哈马碧模式助力中国可持续城镇化发展[N/OL]. (2020-06-14) [2026-01-15]. <https://www.cet.com.cn/wzsy/ycxw/2577878.shtml>.
- [5]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国外生态治理体系的建构模式探析[EB/OL]. (2021-04-22) [2026-01-15]. https://www.bjrd.gov.cn/zyfb/ztssthyqstbhhlsfzt1/tszs/202104/t20210422_2365822.html.
- [6] 谭英. 斯德哥尔摩: 清洁宜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并不难走[N]. 澎湃新闻, 2016-12-16.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81595.
- [7] 朱育漩. 哈马碧生态城如何成为全球典范? [EB/OL]. 中国环境报, 2020-09-14(4).
- [8] KRETZMANN J P, MCKNIGHT J L.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 [M]. Chicago: ACTA Publications, 1993.
- [9] CHAMBERS R. The origins and practice of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J]. World Development, 1994, 22(7): 953-969.
- [10] 周晨虹. 内生的社区发展: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与实践路径[J]. 社会工作, 2014(4): 41-49+153.
- [11] 何艳玲, 蔡禾. 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5): 104-109+128.
- [12] 范斌. 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J]. 学术研究, 2004(12): 73-78.
- [13] 翟慧杰. 欧美社区治理的经验借鉴与启示[J]. 社会治理, 2023(4): 74-83.

Innov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Asset Cultivation, Mutual Nurturing, and Role Reconstruction

Shao Renwei, Xiong Mengdie, Li Yax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characterized by interwoven multicultural elements and heterogeneous interests, pose unique challenges to governance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ism and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on. Community social work, with it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professional methodologies, is significant in addressing the governance dilemma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This paper selects two exemplary case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namely Arlingt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mmarby in Sweden, to analyze their practical logic in addressing governance dilemmas. The Arlington community promotes deep empowerment of residents from decision-making participation to action implementation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channels and a multidimension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that links diverse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The Hammarby community relies on the systemically integrated concept of "co-living city," 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multi-leve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to build a sustainable endogenous circular ecosystem fro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o resident co-creation. These practices demonstrate that the core of community social work's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 lies in: cultivating intangible assets such as cultural skills to replace resource consumption, constructing a two-way, mutually-enriching value cycle through platform empowerment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transitioning the role of social workers from service providers to facilitators who catalyze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Key words: community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overnance; empowerment

■责任编辑：王明洲